

胡适精品集

# 我的歧路

胡适



# 古月

# 之前

主编 / 胡明

光明日报出版社

胡适精品集 4

# 我的歧路

主编 胡明

光明日报出版社

我的歧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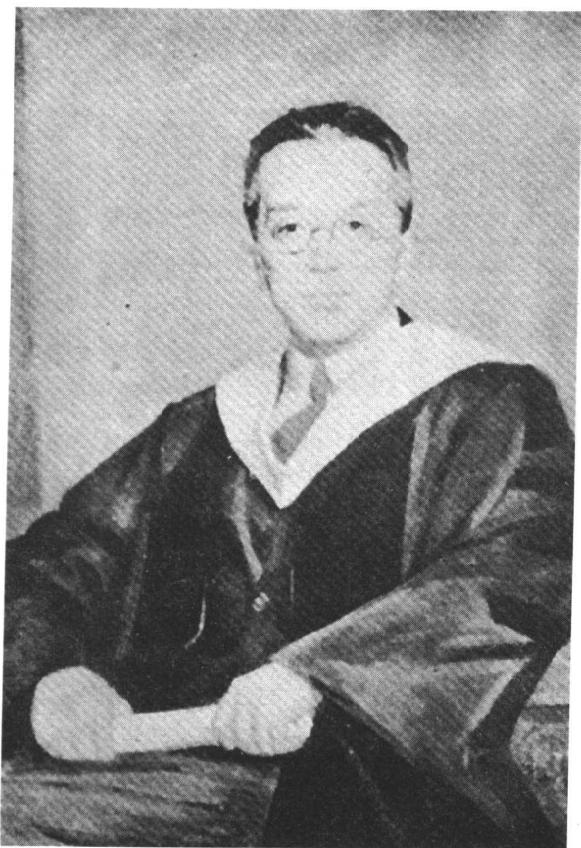
開卷

1921-1924

有  
興  
益

胡商





胡适的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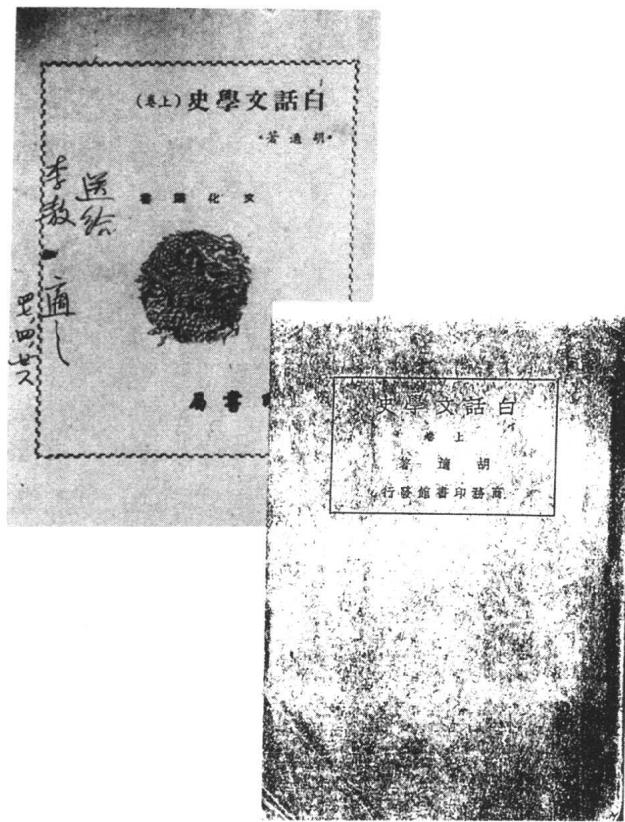


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好像是少數服從多數，其实他的最精采的一点是多數不欺負少數，不敢不尊重少數，更不敢威脅迫少數，毀滅少數。

其次，我要說明「科學」只是一個方法。

科學不是堅甲利兵，飛機大砲，也不是声光，電化。那些東西都是科學的生產品，並不是科學本身。科學本身只是一個方法，一個態度，一種精神。這個方法並不是西洋人單獨發明的，乃是人類的常識加上了嚴密的制裁和訓練。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講博物學的方法，曾叫他做「沙翁的方法」（The Method of Zadig）。沙翁是伏爾泰（Voltaire）小說裏一個古代巴

胡适手迹。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的最早版本。

# 目 录

十七年的回顾	(1)
祝《白话晚报》	(7)
黄梨洲论学生运动	(9)
《政治概论》序	(13)
《天乎帝乎》序	(18)
我们的政治主张	(19)
附录：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	(23)
我的歧路	(57)
附录一：王伯秋先生来信	(64)
附录二：傅斯棱先生来信	(66)
附录三：答伯秋与傅斯棱两先生	(68)
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	
——答陈独秀	(70)
附录：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陈独秀)	(76)
国际的中国	(82)
一个平庸的提议	
——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	(88)
一年半的回顾	(96)
这一周	
——十一年六月至十二年四月	(103)
吴敬梓年谱	(200)

《西游记》考证	(233)
附录:读《〈西游记〉考证》(董作宾)	(269)
《镜花缘》的引论	(278)
跋《〈红楼梦〉考证》	(310)
附录:《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蔡子民)	(319)
《水浒续集两种》序	(325)
《三国志演义》序	(342)
高元《国音学》序	(350)
赵元任国语留声片序	(354)
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358)
《中古文学概论》序	(368)
评新诗集	(373)
《尝试集》四版自序	(386)
《蕙的风》序	(390)
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	(398)
北平的平民之学	(406)
附录:谈北京的歌谣(常惠)	(413)
《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卷头言	(423)
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	(426)

# 十七年的回顾

我于前清光绪三十年的二月间从徽州到上海求那当时所谓“新学”。我进梅溪学堂后不到两个月，《时报》便出版了。那时正当日俄战争初起的时候，全国的人心大震动，但是当时的几家老报纸仍旧做那长篇的古文论说，仍旧保守那遗传下来的老格式与老办法，故不能供给当时的需要。就是那比较稍新的《中外日报》也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期望。《时报》应此时势而产生。他的内容与办法也确然能够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因此《时报》出世之后不久就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几年之后《时报》与学校几乎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了。

我那年只有十四岁，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颇有一点文学的兴趣，因此我当时对于《时报》的感情比对于别报都更好些。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我记得有一次《时报》征求报上登的一部小说的全份，似乎是《火里罪人》，我也是送去应征的许多人中的一个。我当时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的专著都剪下来分粘成小册子，若

有一天的报遗失了，我心里便不快乐，总想设法把他补起来。

我现在回想当时我们那些少年人何以这样爱恋《时报》呢？我想有两个大原因：

第一，《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的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我记得《时报》产生的第一年里有几件大案子：一件是周生有案，一件是大闹会审公堂案。《时报》对于这几件事都有很明决的主张，每日不但有“冷”的短评，有时还有几个人的签名短评，同时登出。这种短评在现在已成了日报的常套了，在当时却是一种文体的革新。用简短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工夫去点句分段，不消费工夫去寻思考索。当日看报人的程度还在幼稚时代，这种明快冷刻的短评正合当时的需要。我还记得当周生有案快结束的时候，我受了《时报》短评的影响，痛恨上海道袁树勋的丧失国权，曾和两个同学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这也可见《时报》当日对于一般少年人的影响之大。这确是《时报》的一大贡献。我们试看这种短评，在这十七年来，逐渐变成了中国报界的公用文体，这就可见他们的用处与他们的魔力了。

第二，《时报》在当日确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中国报纸登载小说大概最早的要算徐家汇的《汇报》。那时我还没有出世呢。但《汇报》登的小说一大部分后来汇刻为《兰苕馆外史》，都是《聊斋》式的怪异小说，没有什么影响。戊戌以后，杂志里时时有译著的小说出现，专提倡小说的杂志也有了几种，例如《新小说》及《绣像小说》（商务）。日报之中只有《繁华报》（一种“花报”），逐日登载李伯元的小说。那些“大

报”好像还不屑做这种事业(这一点我不敢断定,我那时年纪太小了,看的报又不多,不知《时报》以前的“大报”有没有登小说的)。那时的几个大报大概都是很干燥枯寂的,他们至多不过能做一两篇合于古文义法的长篇论说罢了。《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或“笑”译著的小说,有时每日有两种冷血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译笔。他有时自己也做一两篇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等,也是中国人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的一段历史。《时报》登的许多小说之中,《双泪碑》最风行。但依我看来,还应该推那些白话译本为最好。这些译本如《销金窟》之类,用很畅达的文笔,作很自由的翻译,在当时最为适用。倘《几道山恩仇记》(*Count of monte cristo*)全书都能像《销金窟》(此乃《恩仇记》的一部分)这样的译出,这部名著在中国一定也会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小说了。《时报》当日还有《平等阁诗话》一栏,对于现代诗人的绍介,选择很精。诗话虽不如小说之风行,也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文学兴趣。我关于现代中国诗的知识差不多都是先从这部诗话里引起的。

我们可以说《时报》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为中国日报界开辟一种带文学兴趣的“附张”。自从《时报》出世以来,这种文学附张的需要也渐渐的成为日报界公认的了。

这两件都是比较最大的贡献。此外如专电及要闻,分别轻重,参用大小字,如专电的加多等等,在当日都是日报界的革新事业,在今日也都成为习惯,不觉得新鲜了。我们若回头去研究这许多习惯的由来,自不能不承认《时报》在中国日报史上的大功劳。简单说来,《时报》的贡献是在十七年前发起了几件重要的新改革。这几件新改革因为适合时代的需要,

故后来的报纸也不能不尽量采用，就渐渐的变成中国日报不可缺少的制度了。

我是同《时报》做了六年好朋友的人，庚戌去国以后，虽然不能有从前的亲密，但也时常相见；现在看见《时报》长大成了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我自然很欢喜。我回想我从前十四岁到十九岁的六年之中——一个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时期——受了《时报》的许多好影响，故很高兴的把我少年时对于《时报》的关系写出来，指出他对于当时读者和对于中国报界的贡献，作为《时报》的一段小史，并且表示我感谢他祝贺他的微意。

但是我们当此庆贺的纪念，与其追念过去的成功，远不如悬想将来的进步。过去的成绩只应该鼓励现在的人努力造一个更大更好的将来，这是“时”字的教训。倘若过去的光荣只使后来的人增加自满的心，不再求进步，那就像是一个辛苦积钱的人成了家私之后天天捧着元宝玩弄，岂不成了一个守钱虏了吗？

我们都知道时代是常常变迁的，往往前一时代的需要，到了后一时代便不适用了。《时报》当日应时势的需要，为日报界开了许多法门，但当日所谓“新”的，现在已成旧习惯了，当日所谓“时”的，现在早已过时了。《时报》在当日是报界的先锋，但十七年来旧报都革新了，新报也出了不少了，当日的先锋在今日竟同着大队按步徐行了。大队今日之赶上先锋，自然未必不是先锋的功劳，但做先锋的人还应该努力向前争这个“先锋”的位置。我今年在上海时曾和《时报》的一位先生谈话，他说：“日报不当做先锋，因为日报是要给大多数人看的。”这位先生也是当日做先锋的人，这句话未免使我大失望。我

以为日报因为是给大多数人看的，故最应该做先锋，故最适宜于做先锋。何以最适宜呢？因为日报能普及许多人，又可用“旦旦而伐之”的死工夫，故日报的势力最难抵抗，最易发生效果。何以最应该呢？因为日报既是这样有力的一种社会工具，若不肯做先锋，若自甘随着大队同行，岂不是放弃了一种大责任？岂不是错过了一个好机会？岂不是辜负了一种大委托吗？

即如《时报》早年的历史，便是一个明显的例。《时报》在当日为什么不跟着大家做长篇的古文论说呢？为什么要改作短评呢？为什么要加添文学的附录呢？《时报》倡出这种种制度之后，十几年之中，全国的日报都跟着变了，全国的看报人也不知不觉的变了。那几十万的读者，十几年来，从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某报某报体例的变更的。这就可见那大多数看报的人虽然不免有点天然的惰性，究竟抵不住“旦旦而伐之”的提倡力。

假使《申报》今天忽然大变政策，大谈社会主义，难道那看《申报》的人明天就会不看《申报》了吗？又假使《新闻报》明天忽然大变政策，一律改用白话，难道那看《新闻报》的人后天就会不看《新闻报》了吗？我可以说：“决不会的”。看报人的守旧性乃是主笔先生的疑心暗鬼。主笔先生自己丧失了“先锋”的锐气，故觉得社会上多数人都不愿他努力向前。譬如戴绿眼镜的人看着一切东西都变绿了，如果他要知道荷花是红的，金子是黄的，他须得把这副绿眼镜除下来试试看。今天是《时报》新屋落成的纪念，也是他除旧布新的一个转机，我这个同《时报》一块长大的小时朋友，对他的祝词，只是：

《时报》是做个先锋的，是一个立过大功的先锋，我希望他不必抛弃了先锋的地位，我希望他发愤向前努力替社会开先路，正如他在十七年前替中国报界开了许多先路！

十·十·三 北京

# 祝《白话晚报》

我的几位同事们，创办了这个《白话晚报》，要我说几句话。我且说我对于这个报的希望罢。

我希望这个报要做到两个地步：

第一，要值得一驳。

第二，要禁得起一驳。

怎么叫做“要值得一驳”呢？北京的报纸实在太多了；一个城里有七八十种日报，谁也看不到了。有好几种报，谁也不要看了。这个时候，何苦又去添出一种报呢？我以为此时在北京，别无办新报的理由，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要出一个有主张的报。说一句话，做一篇文章，办一个报，至少总要有点主张，至少总要值得人家一驳，若是添出一个不痛不痒，没有主张的报，给人家随手丢在字纸篓里去，或是拿去抹桌子，包豆腐干，那种报便不值得一驳了。

怎么说“要禁得起一驳”呢？单有主张，倒也不难。我可以主张张弧做总理，他可以主张讨伐西南，你可以主张卖国。但没有理由的主张，不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主张，或是